



《南园记》与韩侂胄权力合法性的塑造* ——兼论陆游的晚节问题

李超

摘要:历来对《南园记》的讨论皆聚焦于陆游“晚节”问题,而甚少注意到其与韩侂胄的关系。事实上,《南园记》为观察韩侂胄如何塑造自身权力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绝佳材料。外戚、武人、近习的身份让韩侂胄专权面临着先天的合法性缺失,借助于《南园记》可以看到他为弥补该缺失进行的努力:一是通过强调南园的由来以及凸显与韩琦的关系,暗示在宁宗即位上的定策功勋;二是通过在文化艺术活动上的投入,淡化武人身份,营造士大夫形象;三是通过在南园营建上的精心布局展示归隐田园之“志”,以淡化权臣身份。陆游十分精准地传达了韩侂胄营建南园所希望表达的意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人对陆游“晚节”的非议或不为无因。

关键词:韩侂胄;《南园记》;权臣;陆游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4-0084-08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朝一位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他兼具外戚、武人、近习三重身份,在宁宗朝前期执掌朝政长达十四年,先是制造了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继而又发动了旨在恢复中原的开禧北伐,对南宋一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史》将韩侂胄列入《奸臣传》,对其人予以全盘否定。但在后世看来,韩侂胄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有论者认为韩侂胄无论制造党禁还是发动北伐,皆出于对权力的野心;有论者认为韩侂胄的作为有其合理性,应当给予全盘肯定;亦有论者既承认韩侂胄对权力的追逐,同时也肯定其施政存在的合理性成分,特别是在北伐上表现出的正义性一面^①。对于这样一位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从多个视角综合考量。在宋代士大夫政治下,无论外戚、武人还是近习涉足政治皆不具备天然的合法性,孝宗朝轰轰烈烈的反近习斗争即为明

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韩侂胄能够执掌朝政十四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在皇权庇护下,韩侂胄或可暂时压制士大夫群体的不满与反抗,但显然非长久之计。他也不断通过缓和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关系,为自身权力塑造合法性。

陆游的《南园记》恰好为观察韩侂胄如何塑造权力合法性提供了难得的材料。陆游晚年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的行为,引发出一段围绕其晚节问题聚讼纷纭的历史公案^②。这些争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将《南园记》与陆游联系起来,将之视作陆游本身思想情感的表达。这固然有其道理,却也在有意无意间掩盖了该文的另一层重要价值,即其与韩侂胄的密切关联。陆游撰写《南园记》本是出于韩侂胄的盛情邀约,记文描述的对象亦是韩侂胄营建之私家园林——南园。更重要的是,记文完成后得到了

收稿日期:2024-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宋中期的权臣政治与道学研究(1194—1207)”(19CZS021)。

作者简介:李超,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03),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文化史研究。

韩侂胄的高度认可。一位名叫郑棫的进士“自作《南园记》，并砬石以献”^{[1]66}，但韩侂胄“以陆《记》为重，仆郑石瘞之地”^{[1]66}，同时将陆文刻石立碑于南园中供人瞻仰。如果说《南园记》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陆游的真情实感还存有争论的话，那么说其准确反映了韩侂胄想要向世人传达的思想主旨当是可以确定的。笔者认为，无论南园的营建还是邀请陆游撰写《南园记》，韩侂胄的行为背后都贯穿着同一个政治诉求，即借此塑造长期专权的合法性。本文将围绕对《南园记》内容的解读，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韩侂胄塑造自身权力合法性的努力进行一些探讨，在此基础上就陆游的晚节问题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一、暗示定策功勋

《南园记》是陆游应邀为韩侂胄的私家园林南园撰写之记文，开篇就交代了南园的由来，“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1]186}。“慈福”指高宗吴皇后，高宗去世后退居慈福宫，至光宗朝被尊为太皇太后。南园本属皇家园林，吴太后于庆元三年（1197年）赐予韩侂胄。韩侂胄得到南园后进行了一番精心营造，《南园记》称：“公既受命，乃以禄赐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态别。”^{[1]186}可见韩侂胄对南园的建设规划颇为用心。

文中称韩侂胄为“今少师、平原郡王”。韩侂胄加少师、封平原郡王在庆元五年（1199年）九月^③，次年十月又由少师加官太傅^④。据此，《南园记》的撰写当在庆元五年九月至次年十月之间，这也应该是南园营建完成之时。自庆元三年获得赐园，至庆元五年、庆元六年（1200年）之际营建完工，历时两三年之久，想见工程规模当颇为浩大。南园中最大的厅堂名为许闲堂，宁宗皇帝“亲御翰墨以榜其颜”^{[1]187}。无论赐园还是亲题匾额，体现的都是君主对立有功勋之元老重臣的恩宠，如绍兴初年，高宗就将平江朱勔南园赐予韩世忠，并亲自题其赐书阁曰“懋

功”^⑤。吴太后赐园与宁宗题额，彰显出的无疑也是对韩侂胄功勋的肯定。韩侂胄的功勋何在呢？这在时人眼中是不言而喻的，即其在宁宗即位时立下的定策殊勋。

孝宗去世后，光宗拒绝过宫服丧，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后吴太后与赵汝愚等宰执大臣内外合作，推动光宗禅位于宁宗，此即绍熙内禅。在此期间，韩侂胄凭借外戚与近习身份在内廷与外朝间居中联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尽管后来道学群体多强调赵汝愚在内禅中的核心作用，但在当时，尤其是在宫廷方面看来，韩侂胄似乎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周密就称其时“宫中及一时之议，皆归功于侂胄，自是出入宫掖，居中用事”^[2]。面对赵汝愚及其道学支持者接二连三的攻击，宁宗始终对韩侂胄予以维护，主要即是出于对他在拥立事上的感激。凭借皇权支持，韩侂胄在与赵汝愚的政争中获胜，韩侂胄也成为在宁宗即位上最主要的定策元勋，陆游的一首祝寿诗就恭维其是“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3]755}。

在宋代，“大臣勋业，莫重于定策”^[4]，定策殊勋顺理成章地构成了韩侂胄长期专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韩侂胄对此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嘉泰元年（1201年），起居郎王容上疏“请以韩侂胄敷陈宗庙大计事迹付史官”^{[5]2491}，得到朝廷允许。所谓“韩侂胄敷陈宗庙大计事迹”即是指其在宁宗即位上的定策功勋，《续编两朝纲目备要》记载此事时直接称“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6]114}。如此做法的目的自然是借此确认韩侂胄的定策之功，为其长期专权提供合法性。

正因如此，在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等人随即对官方史书的相关记载进行修改^⑥。嘉定元年（1208年）二月，“诏史官，应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及奸言诬史并行改正”^{[5]2537}，理由则是以韩侂胄“冒定策功也”^{[6]194}，上距韩侂胄被杀不过三个月左右。定策之功既为“冒定”，韩侂胄专权的合法基础自然完全消失，他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奸臣。

正反两方面的记载，将定策功勋之于韩侂胄专权的意义显露无遗。而吴太后赐南园予韩侂胄，宁宗亲自为许闲堂题写匾额，显然是从另一角度确认了韩侂胄的定策之功。陆游在《南

园记》中对南园由来等情况的描写,不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是有意识地让世人联想起韩侂胄在拥戴宁宗上的功绩。

《南园记》中有关韩侂胄定策功勋的暗示,还表现为对韩侂胄与韩琦关系的刻意强调。记文称:“既成,悉取先侍中、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阁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蓄水艺稻,为困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鹭之地曰归耕之庄。其他因其实而命之名。堂之名则曰夹芳,曰豁望,曰鲜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1]187}魏忠献王指韩琦,韩侂胄为韩琦曾孙。陆游简要描述了南园中亭台楼阁等各色景致,共计二十处,其名称全部节取自韩琦诗文。不难想见,这些名称当亦出自韩侂胄的手笔。韩琦是仁宗、英宗、神宗朝的元老重臣,声望卓著,是韩氏一族兴旺发达的奠基者。韩侂胄强调与韩琦的关系以彰显出身名门本无可厚非,但将南园中所有景致皆以韩琦诗文命名,就显得颇为刻意。

韩侂胄还建有阅古堂,其旁有泉,名阅古泉,陆游为韩侂胄撰写的另一篇记文即为《阅古泉记》^⑦，“阅古”二字亦是承袭韩琦当年所建之阅古堂。不仅如此,有学者专门搜集了有关韩侂胄所使用之印鉴,共计六方,分别是“昼锦堂印”“永兴军节度使印”(或名“阅古永兴军节度使印”)、“韩侂胄印”“阅古珍玩”“阅古审定法书之印”“安阳开国印”,其中除“韩侂胄印”外,无不与韩琦密切相关^⑧。如此汲汲于凸显与韩琦的关系,韩侂胄似乎别有深意。

韩琦虽是仁宗至神宗朝的元老重臣,勋绩斐然,但在时人看来,其一生最为重要的功绩则是在英宗和神宗继位上的定策之功,故熙宁八年(1075年)去世后神宗亲篆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7]10229},至徽宗朝又“追论琦定策勋,赠魏郡王”^{[7]10230}。可以设想,韩侂胄刻意强调与韩琦的关系并非单纯出于血脉亲情,而是有意识地通过韩琦当年的功绩,来让世人联想到自己在宁宗即位上的定策之功,暗示其就是另一个“韩琦”,借此提升声望与地位,为其专权塑造合法性。

二、凸显士大夫形象

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殊环境下,集外戚、武人、近习身份于一身的韩侂胄要想长期专权,存在着身份上的严重障碍。宁宗即位后韩侂胄因定策殊勋深得倚信,但论者已注意到,韩侂胄的官阶虽不断提升,但直至开禧元年(1205年)出任平章军国事前,未曾担任过任何实际差遣^⑨。在宁宗朝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韩侂胄专权的方式都只是凭借外戚身份出入宫廷,利用宁宗的信任来间接掌控朝政。这种专权模式存在着相当的风险,一是名不正言不顺,权力严重缺乏合法性,很容易受到外朝士大夫群体的质疑与批判;二是其权力的强弱大小寄托于皇帝的信任,很容易受到来自后妃、宦官等其他内廷势力的挑战。如何突破身份限制,改变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为自身权力披上一层合法性外衣,成为韩侂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韩侂胄选择的破解途径之一,是改善与士大夫群体的关系。宁宗初年,韩侂胄依托皇权支持击败了赵汝愚及其道学支持者,进而制造了庆元党禁。但他并不希望对道学中人穷追猛打,大约庆元三年以后,逐渐放松了对道学的打压,转而采取笼络措施,“时侂胄以势利盪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弃疾、陈谦皆起废显用,当时固有困于久斥,损晚节以规荣进者矣”^{[7]13774},表明士大夫群体的承认与支持对于其专权的维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南园建成后,记文撰写成为韩侂胄笼络士大夫群体的重要手段。据说,他最初选择的作者是杨万里,“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7]12870},但杨万里回之以“官可弃,记不可作也”^{[7]12870},无奈之下遂改请陆游为之。无论杨万里还是陆游,都是其时首屈一指的大手笔,是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借为南园撰写记文向他们示以青眼,自有笼络之意。一旦杨万里或陆游接受邀请,他们撰写出来的文章又会为韩侂胄“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提供重要助力。

韩侂胄突破身份限制的另一条途径,是形塑自身的士大夫形象。韩侂胄虽由武官进身,后又入阁门任职,但他身上的武人色彩并不明

显,出身外戚世家的他本就有着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元代《图绘宝鉴》记载:“韩侂胄善水墨竹石,所画大叶琅玕,自称‘太师竹’。”^[8]掌握权力后,韩侂胄在文化事业上投注了相当心血,虽然史料缺失较多,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在南园之外,韩侂胄营建有阅古堂与阅古泉,这里不仅风景秀丽,更是韩侂胄着力打造的一处文化活动中心。

首先,韩侂胄在阅古堂中收藏了大量图书字画、古玩珍品。《鹤林玉露》记载:“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国,札下本军取之……置之阅古堂中。”^[9]由此反映出韩侂胄对苏轼的喜爱。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米元章帖十二册……闻是韩侂胄故物,中间韩魏公家园池诗,各有‘阅古珍玩’大印。”^[10]“阅古珍玩”印章自是韩侂胄特意为阅古堂中的收藏而制作,此外又有“阅古审定法书之印”^[11]。这些印章的存在,一方面表明阅古堂中的藏品十分丰富,另一方面也表明韩侂胄有意将阅古堂打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艺“品牌”。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品牌”意识,韩侂胄在阅古堂中的收藏皆经过名家鉴定。袁桷记载:“向冰,文简公裔孙,当韩侂胄聚阅古图画,皆出冰鉴定。自淳熙后,图籍考订之富,惟霁溪向氏、锡山尤延之、诸暨王厚伯三人。”^[12]尤延之即尤袤,是著名的藏书家。王厚伯当是王厚之,为南宋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①。向冰在图籍考订方面能与他们齐名当世,显然亦属名家。韩侂胄阅古堂书画皆经向冰鉴定,品质之高自不待言。

其次,韩侂胄还在阅古堂中进行修书校书活动。叶绍翁在记载阅古堂时提道:“其云岩之最奇者曰‘云岫’,韩命程有徽校《通鉴》于中。”^[1]¹⁸⁵程有徽与陆游颇有交情,陆游称:“杜兴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诗文得名于诸公,而尤与予善。”^[3]³⁶⁷陆游曾受程有徽之托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其中对两人关系有进一步说明:“始予自蜀召归,出为江南西路常平使者,进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诗为贄,卓然有元和遗风。予刮目视之,自是二十余年间数相见。及见于临安,程君已入太学,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动一时。”^[13]是则程有徽早年即以诗文出名,后入临

安太学,“才名动一时”,韩侂胄必然是因其才名方将之招揽门下修治《通鉴》。

最后,韩侂胄还专门刊刻了以阅古堂命名的书法作品集——《阅古堂帖》。曾宏父记载《阅古堂帖》乃“平章韩侂胄自镌其家藏墨迹”^[14]²⁵而成,共十卷,“首卷全刊南渡以后帝后御书,二卷则晋隋名贤帖,三则唐名贤帖,四则怀素千文,五、六暨九卷悉本朝名贤帖,七卷全刊山谷书,八卷全刊米元章书,末卷则蔡忠惠、石曼卿帖”^[14]²⁵。有学者指出《阅古堂帖》从编次、内容、技艺上相比法帖之祖《淳化阁帖》都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甚至青出于蓝^②。

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与韩侂胄本身的文化品位密切相关,但毫无疑问也加强了其与文人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关系,淡化了武人、近习身份,形塑出更为鲜明的士大夫样貌^③。上述两方面显然是紧密相连的,改善与士大夫群体的关系有助于自身士大夫形象的塑造,而士大夫形象的塑造反过来又会为改善与士大夫群体的关系提供更多便利。

三、淡化权臣身份

在宋代的政治氛围中,权臣本身已颇遭批评,近习专权更是为士大夫群体所不能容忍。韩侂胄从专权之初便饱受批判,如何改变此种局势成为韩侂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设法淡化权臣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韩侂胄邀请陆游撰写《南园记》的现实政治背景,而陆游对记文主旨的阐发可以说很好地反映了韩侂胄的意愿。

《南园记》在铺叙了南园景致并予以赞美后,开始阐发韩侂胄营建南园想要表达的“志向”,言道:“然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1]¹⁸⁷文中认为韩侂胄精心营建南园并非纯粹为了观赏游玩之乐,而是意在展现心中的“志向”。南园诸景致中最大的厅堂名为“许闲”。此外还有一处景致名唤“归耕”,“其渚水艺稻,为困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1]¹⁸⁷,是一处刻意营造的田园风光。顾名思义,两处景致的命名意在表达一种对远离官场纷扰的山水田园

生活的向往。我们当然不能相信韩侂胄有心归隐,但无论许闲堂还是归耕庄皆由其亲自命名,至少是在有意识地向外界传达这层意思。在宋代笔记中有一则关于赵师翼的著名轶事,《鹤林玉露》载:“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气象。平原尝游其间,甚喜曰:‘撰得绝似,但欠鸡鸣犬吠耳。’既出庄游他所,忽闻庄中鸡犬声,令人视之,乃府尹所为也。平原大笑,益亲爱之。”^{[9]165}府尹即担任临安知府的赵师翼。此故事出于嘉定年间临安三学士人杜撰,并不可信。值得注意的是,三学士人设定的故事发生场景是在南园中一处具有“田家气象”的“村庄”,这岂非就是记文中所描述的“归耕庄”?故事中韩侂胄向同游者明确表达了对田园景象的喜爱。三学士人刻意选择此场景作为故事发生地,表明韩侂胄经常与朝野人士在南园中宴饮游玩,且时常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故而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陆游在记文中称“许闲”“归耕”正是韩侂胄的“志向”所在,应该是符合韩侂胄本人意愿的。有学者指出,在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隐逸文化特征,即士大夫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身居庙堂之高而心存江湖之志的隐逸精神”^⑧。韩侂胄一再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可以视作对士大夫品位与情趣的追求,是塑造自身士大夫形象的一个环节。但若仅作此解,似乎还不能揭示其全部意义所在。

随后记文将韩侂胄的归隐“志向”与韩琦联系起来,“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王之志也”^{[1]187}。正是这种家风传承让韩氏一族百余年来人才辈出,辉煌鼎盛,而韩侂胄无疑是继韩琦之后韩氏家族最为出色的代表,“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1]187}。韩侂胄一方面一如韩琦为朝廷竭尽忠诚,为社稷立下殊勋;另一方面又如韩琦一般谦逊退抑,无心权位。换句话说,韩侂胄几乎就是韩琦再世。将韩侂胄的归隐“志向”与韩琦相关联,除“许闲”“归耕”取自韩琦诗文外,也有着一定的事实基础。韩琦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定策拥立英宗与神宗,但在神宗继位不久坚持辞去宰相之位,此后一直辗转地方任职直至

去世,堪称知止谦退的典范。陆游将韩侂胄的“归隐”之志与韩琦联系起来,是否如后世论者所言是在借题发挥,有意借韩琦来规劝韩侂胄早日离开官场回归田园?似乎不然。

紧接着上文的叙述,记文笔锋一转自我设问道:“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1]188}面对皇帝的信用与倚重,韩侂胄即便想要归隐田园,能够实现吗?陆游随即答道:“是不然。”^{[1]188}明确否定了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他进而解释称:“上之倚公,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1]188}叶绍翁认为陆游此句寄寓有“微词”^⑨,似是指陆游有意规劝韩侂胄隐退。事实上,该句意在断然否定韩侂胄的归隐之“志”与他为皇帝倚信之间矛盾的存在,强调有归隐之“志”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皇帝任用。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始终心怀归隐之“志”,韩侂胄才能够也才值得皇帝如此倚重,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故记文最后说道:“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1]188}撰写记文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表明,韩侂胄自始至终并无贪权恋栈之心,留身朝廷掌权任事完全是皇帝的需要与挽留,是出于对皇帝和江山社稷的一片赤诚。这就将“归隐之志”与“专权之势”两种看似对立矛盾的事物完美地调和统一起来,前者的存在恰好为后者的存续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落在韩侂胄身上的“权臣”色彩大大减弱。陆游不仅不是在规劝韩侂胄早日隐退,反而是在为其长期专权提供合法性论证。这应该是记文最终得到韩侂胄高度认同的最重要原因。

四、陆游晚节问题再思考

《宋史·陆游传》记载:“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7]12059}为韩侂胄撰写《南园记》成为陆游晚节上的一个“污点”,在当时即颇遭物议。千百年来,陆游的晚节问题已衍生为一场聚讼纷纭的历史公案。针对陆游撰写《南园记》的动机,分别出现了“勉以忠献事业说”“奖借侂胄,

完成克复大业说”“不顾细行、失身堕节说”“为子女及生活所计说”“失于矜慎说”等种种不同观点^⑤。近年还有学者从韩、陆两家世代交好的角度来探讨陆游与韩侂胄的关系^⑥。这些观点围绕陆游的动机或质疑批判,或出而辩护。但总体而言,为陆游辩护者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为陆游辩护已成主流^⑦。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近现代以来陆游爱国诗人形象的日益凸显相呼应的。只是这些学者辩护的思路存在一些差异,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承认韩侂胄的“权臣”或“奸臣”身份,但认为陆游在《南园记》中对韩侂胄并没有任何阿谀谄媚之辞,反而利用对记文主旨的阐发,委婉表达了规劝韩侂胄早日隐退的意思;另一种则是将陆游北伐恢复中原的理想与韩侂胄的恢复立场联系起来,认为陆游在记文中表达了鼓励韩侂胄领导北伐的意思。这两种为陆游辩护的观点皆源于对《南园记》主旨的解读,前者认为陆游意在规劝韩侂胄,后者认为陆游意在鼓励韩侂胄北伐,指向几乎截然相反。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上文已指出,陆游虽然在记文中阐明了韩侂胄心怀“归隐”之志,但这本就是韩侂胄在南园经营规划上有意向外界传达的讯息,究其目的则在于淡化自身的“权臣”色彩,为长期专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而非真的想要归隐田园。陆游将韩侂胄的“归隐之志”与“专权之势”两种看似对立的事物完美统一起来,从一个颇为新颖的角度为其专权的合法性做了论证,从而得到了韩侂胄的高度认可。试想,若陆游此文果真含有劝退之意,无异于是在响应其时朝野上下批判韩侂胄专权的呼声,韩侂胄又岂能坦然接受,并将之刻石立碑于南园中供人瞻仰。

那么,陆游有无可能在记文中隐含激励韩侂胄北伐恢复之意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论者多将陆游向来坚持的恢复理想,与后来韩侂胄倡导发动开禧北伐简单联系起来,想当然地认为陆游撰写记文是有意激励韩侂胄北伐。实际上,记文中根本看不到任何与恢复相关的文字。有论者将记文中陆游规劝韩侂胄继承先祖韩琦之志,解读为要求韩侂胄举旗北伐^⑧,显属牵强附会。持该观点者存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于,误认为韩侂胄自上台之初就倾向于北伐恢复。这是与历史事实存在距离的。虽然韩侂胄后来发动了开禧北伐,但在南宋的史书记载中,也仅是将此事的发端上溯至嘉泰元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先是,韩侂胄用事久,有劝其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以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为兴州都统制,规陕之意自此起矣。”^[15]这里将嘉泰元年吴曦归蜀视作韩侂胄有意北伐的起点。庆元年间,朝廷的政策基调是“安静”,决策者倾向于维持现状,对北伐并无热情,宰相京镗即为典型。京镗是韩侂胄的主要支持者,杨万里在其墓志铭中记载:“边臣每奏北虏事宜,公劝上不必问彼,而自为备。”^[16]墓志系此事于庆元五年。在京镗看来,面对金朝局势的变化,南宋只需做好自身防备即可,不必采取更多积极行动。其时韩侂胄的立场恐亦相差无几,他后来转向北伐则是南宋内部政治局势变化的结果^⑨。在倾向“安静”的政治氛围中,在韩侂胄没有明显表现出北伐意愿的情况下,陆游贸然在应邀撰写的记文中表达恢复意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其果然表达了这层意思,也不会得到韩侂胄的认可而将之刻石。可以确信,所谓陆游在记文中激励韩侂胄北伐的说法,基本上是后世论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并无切实根据。

由此来看,既有为陆游辩护的观点都因缺乏有力论据而难以成立,有些分析甚至已脱离了《南园记》本身而进入了想当然的层面。在《南园记》中,陆游既没有表达规劝韩侂胄隐退之意,更不存在激励其北伐的意图。综合本文的分析,陆游在记文中更多地只是在按照韩侂胄本身的意思进行铺陈阐发,并没有加入太多自身思想在里面。但从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看,则确实可能对韩侂胄的专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 语

于韩侂胄而言,南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与一般达官显贵的私家园林不同,南园本为皇家园林,由高宗吴皇后赐予韩侂胄,本身即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韩侂胄接受南园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精心改造,使其成为临安

首屈一指的名胜,“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1]¹⁸⁷。可以想见,南园必然成为韩侂胄宴饮游玩之重要处所,但这并非其全部意义所在。韩侂胄对南园的精心营建,至少蕴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政治意图:第一,南园既为吴太后所赐,体现的是来自皇室的倚信与恩宠,背后则是对韩侂胄在宁宗即位上定策殊勋的肯定。在南园的规划中,韩侂胄刻意凸显与韩琦的渊源关系,同样是意在借助韩琦当年在英宗、神宗即位上的定策之功,让世人联想到自身的定策殊勋。第二,通过邀请陆游为南园撰写记文,以及在阅古堂等地打造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等方式,韩侂胄有意改善与士大夫群体的关系,塑造自身的士大夫形象,以弱化武人身份。第三,韩侂胄刻意在南园中营造归耕庄与许闲堂这两处代表山水田园生活的景致,则意在彰显自身并无贪权恋栈之心,执掌朝政完全是迫于皇帝的倚信,是为报浩荡皇恩的无奈之举,以此淡化身上的“权臣”色彩。三个方面的意图有着共同的指向,即塑造自身权力的合法性。

若要顺利将这些意图传诸天下,让它们为塑造自身权力合法性服务,仅仅依靠南园本身是难以做到的。韩侂胄固然可以通过在南园中进行的各种宴饮集会向士大夫群体表达“心意”,但宣传范围毕竟是相当有限的。他还需要一篇与南园地位相匹配的记文将“心意”传诸天下,这应该是他迫切追求类似杨万里、陆游大手笔撰写记文的因由所在。陆游的《南园记》很好地达成了韩侂胄的意愿,精准传达了韩侂胄想要借助南园表达的主旨思想。在韩侂胄的权势、陆游的声望、南园的美景三者的共同加持下,《南园记》在当时势必流传天下,影响甚广。无论陆游接受韩侂胄邀请撰写记文的初衷如何,《南园记》在客观上都为韩侂胄塑造权力合法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此而言,时人对于陆游的“非议”或不为无因。

注释

① 郦家驹认为庆元党禁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权位的一种表现形式,开禧北伐也只是韩侂胄为了巩固其权位而轻率发动的战争。但郦

家驹并不赞成将韩侂胄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将韩侂胄视为一位由外戚而掌握朝政的权臣。参见郦家驹:《试论关于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张邦炜也认为韩侂胄既不是“奸臣”,也不是“英雄”,而是一位大权在握的权臣,同时也是以权谋私的贪官。参见张邦炜:《韩侂胄平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周梦江则对韩侂胄其人予以全盘肯定,认为韩侂胄是一位爱国的政治家。参见周梦江:《为韩侂胄辨诬》,《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吴雪涛对韩侂胄其人的评价肯定与否定兼有,认为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并非完全出于谋求私利,《宋史》将其列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参见吴雪涛:《略论辛弃疾的一桩公案——兼及韩侂胄与开禧北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冯永林则认为庆元党禁在打击道学势力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其本质上仍是韩侂胄、赵汝愚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倾轧的副产品,对于开禧北伐的评价也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参见冯永林:《关于韩侂胄评价的几点看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②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由来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艾思、蒋凡、王禾皆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艾思:《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论争评述》,《殷都学刊》1989年第4期;蒋凡:《陆游晚节评议》,《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王禾:《庆元党禁与文人命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③④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6页,第728页。⑤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0页。⑥关于“韩侂胄事迹”的相关情况可参见贾连港:《“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⑦⑧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5—186页,第65页。⑨⑩王伟琴:《南宋文人与韩侂胄的交游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⑪韩冠群:《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⑫关于尤袤与王厚之的情况可参见黄宽重:《南宋中期士人的〈兰亭序〉品题》,载氏著《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6—236页。⑬黄宽重就宋高宗崇尚艺文的行为指出:“高宗崇尚艺文,貌似为个人雅好,实亦是延续北宋皇室传统,彰显与历代君王的文化连接”,最终目的则在于塑造政权的正统性。参见黄宽重:《中兴继统下的南宋艺文风尚》,载氏著《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9—114页。韩侂胄与宋高宗虽身份有别,但其崇尚艺文的行为均非仅限于个人喜好,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目的。⑭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

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04页。⑮具体讨论参见艾思：《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论争评述》，《殷都学刊》1989年第4期。⑯高利华：《亘古男儿——陆游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42页。⑰朱东润：《开禧北伐前后陆游的政治立场和他在作品中的表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施光明：《陆游“不得全其晚节”说辨诬》，《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白敦仁：《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上）》，《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白敦仁：《关于陆游的所谓“晚节”问题（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艾思：《关于陆游“晚节”问题的论争评述》，《殷都学刊》1989年第4期；张毅：《潜在的理学家立场和模糊的历史图景——陆游“晚节”问题的探讨》，载吴兆路、[日]甲斐胜二、[韩]林俊相主编：《中国学研究》第11辑，济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142页；蒋凡：《陆游晚节评议》，《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⑱王禾：《庆元党禁与文人命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⑲李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222页。

参考文献

- [1]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2]周密.齐东野语[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43.

- [3]陆游.剑南诗稿: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林珙.古今源流至论:前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31.
[5]宋史全文[M].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6]续编两朝纲目备要[M].汝企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孙岳颁,等.御定佩文斋书画谱[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32.
[9]罗大经.鹤林玉露[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
[10]周密.云烟过眼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
[1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21.
[12]袁楠.袁楠集校注[M].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064.
[13]陆游.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册[M].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49.
[14]曾宏父.石刻铺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825.
[16]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4767.

The Record of the Southern Gard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n Tuozhou's Political Legitimacy: Discussion on Lu You's Integrity in His Later Years

Li Chao

Abstract: Historical discussions of *The Record of the Southern Garden* have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Lu You's integrity in his later years, often overlooking its connection to Han Tuozhou. In fact, *The Record of the Southern Garden* provides an exceptional lens for examining how Han Tuozhou constructed his own political legitimacy. As a imperial in-law, military figure, and ruler's coterie, Han's autocratic rule was inherently undermined by a lack of legitimacy. From *The Record of the Southern Garden*, his efforts can be seen to address this deficit. First, by emphasizing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rn Garden and highlighting his ties to Han Qi, he subtly implied his pivotal role in Emperor Ningzong's ascension; second, by investing in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he downplayed his martial background and cultivated the image of a scholar-official; third, by meticulously designing the Southern Garden's layout, he projected an aspiration to "return to pastoral life", thereby obscuring his status as a powerful minister. Lu You conveyed Han Tuozhou's intended message with remarkable precision. In this sense, contemporary criticism of Lu You's integrity in his later years may not be groundless.

Key words: Han Tuozhou; *The Record of the Southern Garden*; powerful minister; Lu You

[责任编辑/晨 潇]